

愛情不用翻譯？父權話語下「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

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本文針對「一杯水主義」一詞溯本探源，考證並論證其倡導者並非傳言或訛語中的柯倫泰夫人（Aleksandra Kollontai, 1872-1952），而是出自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回憶 1920 年秋天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會晤時，列寧下達打擊共黨內瀰漫「一杯水理論」現象的指令。列寧請蔡特金等人組織和召開婦女大會，最後讓柯氏將大會決議寫成共產主義與婚姻性道德的共產黨員「綱領」。藉由梳理此詞的來龍去脈，本文試圖呈現 1920、30 年代在男性主宰話語權和領導權的帝國、黨國與民國世界中，「性」不僅是建／解構意識形態的政治議題，更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隨後在不同時空下，經翻譯與傳播中刻意抹殺愛情的純粹性享樂標籤，抑或史達林主義下無性文化的笑話，皆容易導致女性淪為為集團而犧牲個體自我的工具，或者是被利用成為打擊對手的政治手段。「一杯水主義」的廣泛流傳事實上是父權話語從中作祟，誤讀、誤解和誤用導致的結果。

關鍵詞：柯倫泰、列寧、一杯水主義、史達林主義、母權制

收稿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接受日期：2022 年 9 月 20 日。

致謝詞：感謝科技部支持，本論文是「雌辯、女權與建／救國敘事：柯倫泰與中國左翼女作家的小說比較（1927-1936）」計畫成果之一。謝謝《女學學誌》編輯委員會及三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一、問題意識：回到蘇聯，當愛不見了……

1986 年蘇維埃廣播電視台（Советск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呼應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1931-2022）「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開放性」（гласность）政策，以衛星聯播方式與美國電視台合作了一系列雙方交流的談話性節目。¹在一次「列寧格勒與波士頓」（Ленинград-Бостон）連線節目中，一位美國女性觀眾陳述了美國電視節目的性氾濫，並好奇地對蘇聯來賓提問俄國境內是否也有類似情形。代表列寧格勒來參與節目的女性來賓伊凡諾娃（Людмил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Иванова, 1941-）（蘇聯解體後，人們才得知她當時是「蘇維埃婦女委員會」[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ских женщин]的委員代表）當場回答：「我們這裡沒有性，而且我們堅決反對它。」²此話一出，不但使得美蘇兩國現場觀眾哄堂且意見分歧，節目播出後更引起廣泛國際關注。

英美斯拉夫學界出版的一些專書好以此例為開端，進而探討共黨政策下的兩性關係（可參考 Kon, 1995）。「在蘇聯沒有性」（в СССР секса нет）的說法，成為蘇聯解體前後的共產與後共產國家流行語。例如，1988 年蘇聯與波蘭合作的電影《似曾相識》（*Déjà vu*）更數次引用這句話揶揄蘇聯時期的性別政策。2004 與 2006 年俄國一部兩季電視劇更引此句，將劇名取為 *Союз без секса*（《無性的蘇維埃》）。2005 年 10 月 11 日英國廣播公司 BBC 發表一項民間調查結果，直指

1 兩位電視台主管帕茲聶爾（Владимир Познер）和唐納修（Phil Donahue）。

2 “Секса у нас нет, 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против этого”。託蘇聯解體與現今科技之福，當年的錄影實況片段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較清晰的版本可參閱下列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FSjUhxZk>

關於蘇聯政治最常被提及的話語，並非過往政治領導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而是伊凡諾娃的一個回答（BBC, 2005/10/11）。

「在蘇聯沒有性」，或許被視為蘇聯、抑或後蘇聯後期自娛娛人的「笑話」。然而，誠如俄國諺語：「每個笑話皆有其真實成分。」³生長在史達林時代的蘇維埃婦女委員會委員伊凡諾娃，其當下反應和防衛機制原意或許在捍衛蘇聯的一切，卻連帶激發了另一種反面的解讀：史達林主義下「無性亦無別」的政策到了 1980 年代中後的開放時期，依然陰魂不散。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解體十餘年後，此一事件裡的主要當事人終於意識到：披頭四（the Beatles）年代所高唱的 Back to the USSR（《回到蘇聯》）終究是「回不去了」，於是大膽地接受訪問重話當年，進而引發了「性、謊言、錄影帶」的羅生門等問題意識。

帕茲聶爾曾於訪談中一再地重複使用「在蘇聯沒有性」這句話，除了再次確立自己對過去蘇聯性別政策的批評，也暗示自己當年製作一系列美蘇電視節目的前衛性與可信度（BBC, 2017/6/28）。然而，不同於帕氏在可信度上的宣稱，伊凡諾娃接受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共青團真理報》）專訪時卻指控節目資訊造假。她認為製作人為了效果，剪接了她一半的話語，並略帶忿怒與消遣的口吻還原自己當時的全文：「在蘇聯，沒有性，只有愛情（а только любовь）。」她續而指出問題：

所有人卻僅只記得前半句。怎樣？我錯了嗎？在蘇聯時期「性」這個字對我們而言簡直是粗魯而不禮貌的。在當時，我們一向

3 В каждой шутке есть доля правды.

做的不是性，而是愛。這才是我在那時候想表達的本文意思。
(Горелик, 2004/10/01)

上述帕氏與伊凡諾娃共構的蘇聯「笑話」和後蘇聯「真話」等現象，引起下列幾個研究共產與後共產文化和文藝時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首先，儘管在蘇聯共黨的黨國機制下被賦予代言權的個體（通常是委員）可透過強大的媒介發言，但是審查與剪輯的最終話語權依舊操縱在官方手中。因此，當媒介容易操弄斷章取義而反噬主體自由意志時，呈現在影像或攤在資料底下的笑話與真話、流言與謊言又該當如何辨別？

其次，如孔恩（Kon, 1995: 1）所指，「在蘇聯沒有性」這一流行語之所以能立即躍上傳奇的地位，乃因從 1930 年代開始蘇聯社會偽善地無性，甚至消除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並有系統地消除任何與性或性慾相關的文字或物品。史達林主義下的性別文化將女性勞農化與男性化奉為圭臬，也影響了蘇聯文學，特別是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發展（Heldt, 1987; Kelly, 1994; Marsh, 1996）。儘管如此，孔恩書中揭露的是蘇維埃性革命的在地實踐，但在此令人難以忽視的是，此一流行語之所以得以「全球化」，正因為它碰觸了人類社會文化中普遍難以啟齒的性議題，而讓美、蘇兩方的女性觀眾開啟這個話題的卻是兩名男性媒體製作人。如此設置，則不免啟人疑竇：從蘇聯後期「重建」至後蘇聯時期，所謂「去史達林主義」是否等同一種「去在地化」，甚至是擁抱英美領導的「全球化」過程？若進一步站在女性主義角度來看問題，在共產國體的意識形態霸權與話語權鬆動時刻，蘇聯媒體竟是如此容易與西方（泛指英、美、法）資本主義鏡頭下父權的話語結構串連勾結，共同操弄「女體」引發「性」的話題，來達到

政治、商業或背後複雜的動機與目的？從這些角度來看，這些鏡頭背後的時空背景、話語權力機制和兩性關係，益發顯得耐人尋味。

二、愛情「被消失」的敘事真／假相：「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與誤解

出生於史達林時期的伊凡諾娃如此捍衛蘇維埃意識形態的性別教育，提出「在蘇聯沒有性」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她的敘述體現了史達林主義下根除性別差異、壓抑個體性慾的群體性教育。在伊凡諾娃的案例中不難看見，主體（特別是男性）如何透過媒介操弄「女體」與「國體」議題，類似的手法容易令人聯想並回溯蘇聯建國初期喧騰一時且盛行普及的「一杯水主義」現象和問題。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在 1920 年代初期的全球化傳播中，刻意宣傳一杯水主義的背後操作卻是將蘇聯塑造成一個「只有性」的刻板印象的共產（甚至是共夫共妻）帝國。於是，在蘇聯「沒／只有性」，如此兩極的論述使人不禁要問：究竟蘇維埃黨國的性意識（sexual consciousness），以及他們所提倡的「無產階級與新道德」（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новая мораль）論述為何？在七十餘年的共產帝國歷史裡，又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兩極化又極端化的說法和論述？

本文無意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內爬梳蘇聯性教育與兩性政策的歷史，過往文獻研究業已多所著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例如 Kon, 1995）。胸懷這些歷史知識背景，筆者以為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伊凡諾娃的無性論笑話，抑或「一杯水主義」的「傳說」（下文將詳論）皆是在共產主義的黨國意識較為薄弱，且黨內資本主義抬頭，兩種對立主義交鋒的時刻而盛行一時；前者面臨「重建」，後者則興

起於列寧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如果按照這兩種現象及其敘事形成的背景來看，原屬於道德（不論是中產階級的，抑或是無產階級的）禁忌的「性」意識及其議題，在社會轉型的時刻進入公共媒體與討論領域，是否可能是有心人測量水溫的方式，意圖試探共產黨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鬆緊程度呢？

在伊凡諾娃笑話的後續影響下，歐洲影視產業持續對於蘇聯的性意識及其教育產生了高度的興趣。最有趣的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串連起上述現象和問題意識的是德國一家電視台所播放的仿製美國益智遊戲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誰來當個百萬富翁？》），並改名為 *Who Wants to Be a Revolutionary?*（《誰來當個革命家？》）的問答節目。從 2001 到 2003 年間，共有十三萬德國人參與這個關於政治常識的益智遊戲，節目播出後不久，所有問答的題庫被收入書籍並同名發行出版。當中，有一道問答题目如下：

「一杯水理論」為何人所著？

- A. 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
- B. 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 C. 亞歷桑德拉·柯倫泰（Aleksandra Kollontai）
- D.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在這個《誰來當個革命家？》的節目及其書中，正確答案是 C，書內並進一步為「一杯水理論」提供了「學術性」的註釋：「亞歷桑德拉·柯倫泰乃是俄羅斯革命時期的政治活躍者，號召女性對性的需求猶如一杯水——無須思考，不用負責，也不必具備所有浪漫情懷」（引自 Душенко, 2019: 392）。書中不僅註明此徵引源自一本學術小書

刊 *Знаменитая теория “стакана воды” Александры Коллонтай* (《亞歷桑德拉·柯倫泰的著名「一杯水」理論》)，還說明這個理論間或提及克拉拉·蔡特金、依涅莎·阿曼德 (Inessa Armand, 1874-1920) 和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如此問答與解釋，為上世紀新俄羅斯的革命時期，也就是在列寧主義新經濟政策下「泛性論」，提供了一個全然有別於史達林主義化身——伊凡諾娃的無性論觀點。

與伊凡諾娃生長階段的時代相符，也是中、蘇共黨與國民黨在台灣、蘇聯、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別處在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和蔣家父子政權的威權及父權相融的雙重陰影籠罩之下。彼時，國民黨雖承繼列寧主義的一黨獨大卻處於共產主義的對立陣營，而台灣媒體也充斥著「反共抗俄」的敘事。因此，並不令人意外地，台灣讀者第一次在官方媒體上所認識的「一杯水主義」，直接與報導標題中「淫邪不正」、「男盜女娼」這兩個具強烈負面情緒色彩的攻擊詞語連結。讀者就在完全不知「一杯水主義」的來龍去脈及其意涵究竟為何之下，在意識中被預設根植了一種觀念：這是來自蘇俄的性別政策與主義，也就是與一群男邪女淫的盜賊和娼婦雜交等義（見圖一）。

同時，此一報導標題還暗示了另外兩層含意：「一杯水主義」主要出於「權貴之門」，並且是「太保」與「太妹」這一青少年年齡層的產物。更重要的是，這則外電翻譯的報導用字充分凸顯了媒體如何展示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並間接傳播以下訊息：「正確的」性觀念不僅來自於「健康純潔」（「從一而終」和「一夫一妻」？）的道德觀，更奠基在「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官方的」意識形態。反之，則是「淫邪不正」、「男盜女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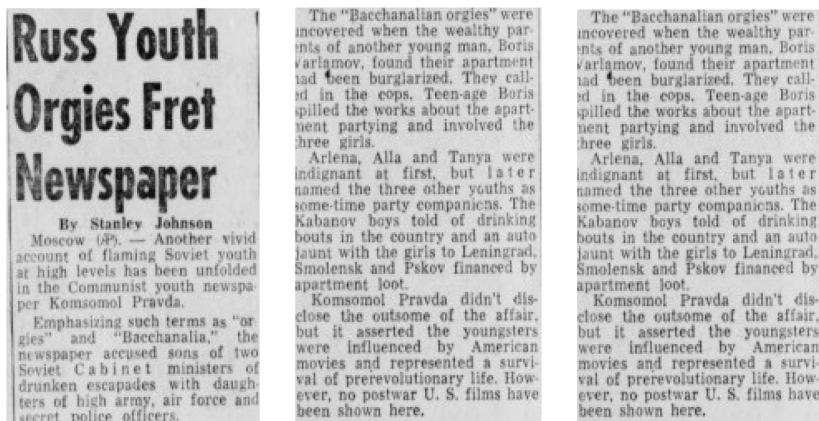
圖一：《中國時報》譯美聯社莫斯科十五日電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1956年8月17日）。

弔詭的是，《中國時報》（1956年8月17日）這篇「一杯水主義」的文章其實翻譯自 *Santa Cruz Sentinel*（《聖塔克魯斯前哨報》）一位美國駐莫斯科記者的外電報導（Johnson, 1956/8/16），且從英文標題（“Russ Youth Orgies Fret Newspaper”）到報導內文並無一字涉及「一杯水理論」（見圖二）。這篇英文報導的內容首先將消息來源指向、引用並翻譯《共青團真理報》的一則新聞：一群蘇聯部長級、紅軍將領與祕密警察等高官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子女（照當代說法即為高幹兼富二代），趁著父母到鄉間別墅度假時，不但聚集在家開狂歡派對，並藉酒意闖空門竊盜。蘇聯官方將整起案件定調為「酒神似的狂歡縱飲」（Bacchanalian orgies）所導致的越軌行為，並將這些青少年的惡作劇歸咎於受到「美國電影的影響與革命前生活的殘餘」

圖二：美國駐莫斯科記者 Stanley Johnson 在 *Santa Cruz Sentinel* 的外電報導



資料來源：Johnson (1956/8/16)。

(Johnson, 1956/8/16)。然而，若細閱這一則英文報導可以發現，美國記者在引述整起事件的用字遣詞中規避了具情緒色彩的修辭，僅在文章最後一句對蘇聯官方的解釋提出具諷刺性的質疑，陳述「在蘇聯沒有一部二次大戰過後的美國電影得以上映」的事實。若再沿著《聖塔克魯斯前哨報》提供的消息來源繼續追溯，卻很難發現《共青團真理報》曾經出現過這則新聞的紀錄。意即，這極有可能是一則假新聞，而《中國時報》更在翻譯這則假新聞的過程中添加了仲介與主動者(agent)的強烈意識形態和主觀意識的道德批判。

儘管筆者在蘇聯真理報系的電子資料庫系統中，尚未能找到美國記者所引用的來源，然而至此已清楚可見：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美蘇兩大帝國對峙，在媒體的操作下，「無性論」或「一杯水主義」顯然被利用成為鞏固帝國或黨國威權與父權話語結構的工具，以及共產主義

與資本主義操作媒體下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攻防戰。當中，「一杯水主義」的媒體「傳說」和翻譯「胡說」，所引發的問題是如何追本溯源，釐清語境、文本與文化脈絡，方可解構包裝著學術性的「流言蜚語」和政治立場不一的「惡言相向」。

同時，令女性主義的人文學者憂心關注的是：當受到不同主義的政治立場干擾，結合性、愛和財產制度的兩性、婚姻或家庭關係的議題，淪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時，是否可能如「在蘇聯沒有性」或「一杯水主義」一樣，使得關於人類的性、愛、財產與社會階級道德等重要辯論在傳播和翻譯的過程中被消失？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別有用心的媒體與不軌的父權操弄下，女性作家或政治家（政客？）諸多的情感與思想被概化為一個無法明說來龍去脈且被誤導的專有名詞，伴隨其後的是「笑話」、「謊言」、「謾罵」、「惡言」或「扣帽子」等攻擊。女性思想在被傳播（包含被翻譯）的過程中，這些不軌的男性話語，猶如政客用來轉移目標、防衛自我的煙霧彈，目的是掩蓋本身真正的動機。再者，「在蘇聯沒有性」與「一杯水主義」的兩例中，潛藏著一種可能性：主體（往往是男性主謀）企圖透過媒體傳播，用以攻擊政治對手只有／無「性」，或者是將蘇聯和蘇維埃文化塑造成「共／無夫、共／無妻的共／無產社會」。如此敘事，是否刻意將世界二分化對立，或是蓄意混淆其中的真與假、有與無，製造諸多混亂，而使多數人無法看清楚主謀是誰、意圖為何，方能從中獲利？在下文中，筆者將論述柯倫泰如何被父權同謀話語的「一杯水主義」綁架，並且追本溯源她當時為何有苦難言的幾個可能原因。

需知蘇聯建國時期的兩性關係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為依歸，其中重要論點就是一旦資本

主義文明解體後，女性就可以從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中被解放出來，回到過去並使「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愛，以一種更高形式的方式出現，重新復活」（Engels, 1902: 217）。然而，如此論點僅存在於理想，甚至更接近空想，因為在實際執行面上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下文列寧論〈婦女、婚姻與性的問題〉一文中可以得到清楚的驗證：共產主義不僅並未從資本主義的手上將女性從男女不平等現象中解放出來，反而讓女性在自以為性自由或解放的兩性關係上，以一種形而下的方式追求純粹的感官享樂。在男性依舊主宰話語權和領導權的世界中，這種純粹性的感官享樂致使女性更容易變成男性眼中的物品、窺淫慾（voyeurism）中的意淫對象，以及兩性生活中便利的性工具。對於柯倫泰思想而言，失去愛情的性就像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女性反而因此更可能淪為男性、群體，甚至遭黨國利用的性與政治工具。「一杯水主義」就是在恩格斯、列寧、柯倫泰，甚至到其後隱身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之間的兩性觀點辯證和政治實踐的過程中生成。既然事涉「主義」，也就無法忽略政治、支持／反對者，以及背後的權力鬥爭。

筆者在先前研究中已經詳論柯倫泰其人與其作（陳相因，2011，2019），出身沙皇制度下「權貴之門」的柯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身為 1917 年革命的領導者之一（見圖三），以及新俄羅斯中央政府的高階部長，又是當中唯一的女性，在中央委員會內委員的排名也超越黨齡比她高的史達林（Trotsky, 1941: 220-221）。⁴因此，柯氏的出身背景、語言天賦、外交手腕、社會人脈和

4 柯倫泰的得票數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僅次於列寧、季諾維耶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卡緬涅夫（Лев Каменев, 1883-1936）、托洛斯基（Лев Троцкий, 1879-1940）與諾金（Виктор Ногин, 1878-1924）。

圖三：「慶祝社會主義革命一周年」明信片



註：為了「慶祝社會主義革命一周年」1918年在彼得格勒發行的明信片，畫面中是俄羅斯共產黨（布）諸領袖肖像，右邊第二行最後一位即是柯倫泰夫人。明信片中清楚可見柯氏是唯一的女性，且史達林並不在革命領導的行列中。

資料來源：2022年3至6月在Муз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聖彼得堡俄羅斯政治史博物館）舉辦的*Кто Вы,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生平展）。葉禹彰攝影，筆者謹此致謝。

政治野心，如同她的為人處世一樣精明和鮮明，無疑是蘇共黨內耀眼的一顆明星（陳相因，2019: 76-77）。因此，在1928年史達林尚未完全掌權之前，柯氏作為列寧繼位者的可能性，從未消失。

柯倫泰與伊凡諾娃在政治生涯和生活中的重要交集，即是史達林及其主義。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史達林主義下的性別政策是否承繼了前述恩格斯或／與列寧理想中「自由、平等、博愛」的兩性社會？抑或，史達林主義的「去性別化」——更精確而言，乃如前述的「勞農化」與「男性化」性別政策——應可被視為另類的封建社會復

活，以明修無產階級女男平等且無差異的棧道，卻暗地增強並鞏固資產階級父權與帝國主義極權的堡壘？若非如此，重建時期的蘇聯媒體何以能夠如此迅速地與美國媒體帝國的父權話語共謀，打造出「在蘇聯沒有性」這句「全球化」的流行語呢？

筆者曾以具體的文本與柯倫泰作為作家的思想，闡述史達林時期與其後的蘇聯社會所實踐的性別政策為何，業已回答了上述的部分問題（Chen, 2006；陳相因，2007, 2011: 1-31, 2019: 75-113, 2020: 7-17）。至於柯倫泰如何在蘇聯、日本與中國開展革命與戀愛的議題，亦有專文詳解（陳相因，2019: 75-113）。然而，這些既有研究尚未針對「一杯水主義」追本溯源，並探索其背景、思想脈絡和傳播過程，以及進入中國的翻譯與風潮所形成的權力結構變化，進一步勾勒中、俄文化異同。再者，過往研究（杉山秀子，2001；秋山洋子，2010；陳相因，2019；吳佩珍，2020）或多或少顯示，柯倫泰的小說對 1920 年代中後期與 1930 年代初期東亞日本的女性左翼文藝運動發展，乃至中國的「革命加戀愛」風潮，大有推波助瀾之效，也吸引不少青年男女，如胡也頻、丁玲，白薇、楊騷與周揚等作家，都在共產黨面臨國民黨清黨、分黨後生死未卜的艱困時刻加入共產黨。既是如此，為什麼柯倫泰小說中無所不在的「愛情」論述和議題在諸多翻譯本問世後，卻鮮少為人所提及，柯氏反而成為眾矢之的，被視為是「傳說」中「蘇聯只有性」的「一杯水主義」始作俑者？

柯倫泰除了以全世界第一位婦女部部長、第一位女外交大使聞達於世，更是在蘇聯建國時期建構政治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開國元老與功臣，往往針對「新婦女」、勞工、兒童福利，以及兩性關係與性別等議題提出不少建言和政策。誠如既有研究所示，柯倫泰在列寧時期的蘇聯共產黨黨內的政治實力，以及在共產國際間聲譽卓

著，不容小覷（陳相因，2011, 2019）。筆者也在先前研究中論述了柯倫泰著作中強調「多面性」與「多弦性」的同志情，以及傳統中能夠展翅飛翔的「愛神」的重要性。因此，「一杯水主義」究竟與柯倫泰思想的關係為何？在建設這個共產天堂的兩性政策過程中，柯倫泰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和地位？她如何承繼、對抗，或者順從這三位男性領導人在愛情與婚姻觀的理想和思想？在了解這些問題之前，筆者以為當務之急在於釐清「一杯水主義」的來龍去脈，方可清楚這些蘇聯共黨的男性領導人如何利用領導霸權指揮婦女；並在黨內震盪之際或黨外紛爭時，利用父權權力結構下的話語權來建構女性。尤其在針對「政敵」柯倫泰時，男性掌權者即揉合、拼貼柯倫泰的日常生活、公開演講和出版著作，以真假摻和的方式來耳語、傳說、構築，甚至構陷柯倫泰本人及其思想。

三、一人黨意、二手回憶與三人成虎：「一杯水主義」的誤信與誤用

不少中外研究者與評論家，如楊爾琳（1981）、杉山秀子（2001）、Rosalind Marsh（2002）、Sophie Coeuré（2021），猶如上述德國益智節目的問答题答案，以一種「理所當然」的手勢和姿態，將「一杯水主義」這一術語的概念與柯倫泰緊密地連結，甚至以為柯倫泰是提倡這一專有名詞的作者。不僅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學者如此言之鑿鑿，其實早在上世紀 1930 年代的中國，「柯倫泰主義」與「一杯水主義」就已經緊密地連結在一起（駱劍冰，1933: 86-89；陳碧蘭，2010: 161；葉華，1999: 13）。然而，絕大部分的先行研究，或是 1920、30 年代的文藝評論者，皆無法具體地指出，柯倫泰究竟是

何時、何地提倡過「一杯水主義」，又是在哪一部小說或著作（包括公開演講與政治論述）曾經明白提出和論述此一專有名詞及其思想。

早在 2008 年，筆者（陳相因，2008）就曾在學術會議論文中提出考證研究：此一專有名詞最早出現於列寧過世後不久出版的一本由德語翻譯成俄文的宣傳小冊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憶列寧》）（Клара Цеткин, 1924），作者是著名的德國婦女運動家克拉拉·蔡特金（俄譯 Клара Цеткин），亦為「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正式名稱為社會主義國際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889-1916）的創始者。此書最早的英文全譯本是 1934 年在紐約出版的 *Reminiscences of Lenin*（Цеткин, 1924 / Trans. Ryan, 1934），而據此英譯而做的中文全譯本，亦是中文最早的全冊首譯《列寧印象記》（Цеткин, 1924 / Trans. Ryan, 1934 / 馬清槐譯，1954）則遲自 1954 年才出版。書中以蔡特金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其中一章記錄了 1920 年秋天某日，她與列寧在克里姆林宮內討論關於婦女的性、愛情與婚姻等問題。列寧針對這些問題發表談話，然而話中有話，強烈批判布爾什維克黨內兩性關係普遍瀰漫著「一杯水理論」⁵的現象。誠如俄國學者 Душенко（2019: 392-393）指出，從全書敘述的方式來看，蔡特金的回憶與其說是與列寧的對話或談話，更確切而言，則是列寧式無止盡的獨白。

儘管蔡特金回憶列寧的中文全譯本在列寧逝世三十年後才出版，但此回憶中記錄的〈婦女、婚姻與性的問題〉一文與「一杯水理論」這一部分最早的譯文，卻可溯源至 1930 年 4 月時，沈端先（夏衍）在雜誌《文藝講座》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沈端先，1930a；夏衍，2005: 278-282）。在這篇文章中，夏

5 兩人以德語進行交談，俄譯為 теория стакана воды，英譯為 theory of a glass of water。

衍成為中國首位將列寧批判蘇共黨內「一杯水理論」的話語，以白紙黑字的形式介紹給中國讀者的譯者。

夏衍翻譯蔡特金回憶列寧談話，關於「一杯水理論」的段落如下：

有許多人說，他們（青年們）的立場是革命的，是適應於 Communist 的，實際上，他們也是那樣的想。可是，只是這一點，是不能使舊時代人折服的。在我看來，這種所謂新的性生活，是純然布爾喬亞的。就是說，這種方式，是布爾喬亞賣笑婦的變態。他們所幹的一切，我們 Communist 是不能理解的。你大概知道吧，現今有一種有名的理論，就是說在 XX 主義的社會，性的衝動和戀愛的要求，非和喝一杯水一般的簡單不可。我們這裡的青年，都是實際的熱心於這樣的理論，而陷於不良的結果。這種理論的信仰者，說這種是真真馬克思主義的。（沈端先，1930a；夏衍，2005: 281）

若以現今的水準來看此一段落的翻譯，讀者難免覺得中英夾雜的部分顯得荒謬可笑，不少地方的用字遣詞亦不合時宜。然而，1930 年仍處於國民政府剿共時期，夏衍為躲避國民政府的文字審查，故以英文作為密碼。儘管 Communist 的原意相當清楚，但民國在大陸時期的審查人員多受傳統教育，泰半不識英文，因此 ×× 主義意指的「共產」，要不無法辨識，要不就是出版社處於上海租借區的灰色地帶，查抄困難，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⁶儘管夏衍在翻譯上做了些現

6 1927 至 1936 年間的左翼文藝刊物文章裡，時常出現關鍵字或關鍵姓名中以特殊符號、英文，或以別字代之，藉以避談共黨或列寧等敏感文字。夏衍這

今看來欲蓋彌彰的手腳，例如在這篇文章裡的列寧被替換成「李」寧，但當時的有心人士一讀仍能立即心神領會。由此翻譯或可推敲，當時國民政府的文字審查員水準大概胸無半點「洋」墨，但仍有一種政治審查標準的可能性——即是傳播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仍有商榷的空間，但若是共產主義與列寧則無轉圜的餘地。至於列寧如何批判「新的性生活」，以及中文在翻譯轉換過程中，「性」的用字遣詞是否出現了語言與文化「等價同值」（equivalent）的問題，下文將有更進一步的分析。

儘管如此，在夏衍白紙黑字的翻譯出版之前，「一杯水理論」早已在第一次國共親密合作的期間為部分政壇高幹子弟所信仰，並「身體力行」。誠如有研究列舉之例證，蘇共黨內的兩性關係與生活充斥著「一杯水」基調，早隨著「聯俄容共」的政策，加上大批國民黨與中共的留蘇學生陸續在 1920 年代中後期回到中國，以及與共產國際互通有無、頻繁往來的國際友人，而為國、共兩黨和各國共黨黨員所熟知（陳相因，2019: 102）。例如，陳碧蘭回憶 1926 年陳獨秀的兒子陳喬年在莫斯科生活時曾經說過：

革命家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只有性交，因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動性的，因而不能結婚；同時革命家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那種小布爾喬亞戀愛的玩意，所以沒有戀愛。走到哪裏，工作在哪裏，有性的需要時，就在哪裏解決，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支香煙

篇〈《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的文章遠非單一例證，筆者信手俯拾六例如下：Коллонтай（1923／柯倫泰、芝威，1928），沈端先（1930b），茂森唯士、沈端先（1930），沈端先（1930c），列裴耐夫、沈端先（1930），易嘉（1932）。

〔菸〕一樣。(陳碧蘭, 2010: 161)⁷

又如，最為蘇聯時期的蘇聯人所熟知的現代中國作家蕭三（Эми Сяо, 1896-1983），1920 年代在蘇生活時同時與前妻瓦莎和女友葉華，以及瓦莎的男友留賓住在同一個屋簷下，讓自己的兒子阿郎同時擁有兩個父親和兩個母親。葉華回憶並描述當時蘇聯社會的風氣：「結婚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一種俗套。於是誰跟誰都可以同居，也可以隨便分手。同時人工流產也合法化了」（葉華，1999: 13）。

由這些例證來看可以得知，從 1924 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到 1927 年清共、分共的這段時間內，「一杯水主義」不論是在蘇聯共產國際，抑或留蘇的國、共兩黨知識分子圈，特別是青年族群中蔚為風潮。但是，經筆者考證，在俄、英、日與中文四種語言的白紙黑字印刷品（包括這段期間共黨內發往蘇聯境內或國際的宣傳小冊）中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此一主義與柯倫泰思想是相互連結的。然而，到了上述 1930 年夏衍的文章〈《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時，卻清楚地把列寧批判的「一杯水理論」，以及柯倫泰的幾篇小說譯成中文成冊的《戀愛之路》與《華茜麗莎》串連起來。直至 1933 年，駱劍冰的一篇文章〈柯倫泰主義與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中，竟已把柯倫泰主義等同於一杯水主義：

7 陳碧蘭認為陳喬年的「一杯水主義」應是受到柯倫泰的〈三代之愛〉影響。筆者已經在研究中指出，陳碧蘭的記憶或轉述很可能出現訛誤（陳相因，2019: 102）。例如，陳碧蘭指出自己回中國後，在 1930 年左右讀了〈三代之愛〉，當中女主角提出兩性關係猶如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樣的說法。但是從研究考察可以發現，1920 到 30 年代的現有俄文原本和中譯版本，內容中並未出現這樣的話語。

我們一提到柯倫泰主義，誰都會記起她說的那兩句話，「戀愛和喝一杯茶一樣的自由，誰都沒有干涉的權利」。因此，被人認為這就是新戀愛論的摩登主義。（駱劍冰，1933: 86）

從 1928 到 1933 年，柯倫泰共有中篇小說“Василиса Малыгина”（〈瓦西里莎·馬勒金娜〉，即《華茜麗莎》，又譯《赤戀》⁸）、短篇小說“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三代之愛〉）⁹、中篇小說“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大愛〉，中譯《偉大的戀愛》¹⁰）、短篇小說“Сестры”（〈姊妹〉），以及政論文章集結的 *Любовь и новая мораль*（《戀愛與新道德》，Коллонтай, 1912 / 沈端先、汪馥泉譯，1929）陸續被翻譯和引介到中國。這些小說與文章，從標題或內容來看，主要探索新時代、新青年與新婦女的戀愛議題，當中「性」、「性慾」、「婚外情」與「婚姻制度」則是附加在這一主軸上的情節來推動故事和論述。綜觀全文，亦無明確倡導「一杯水」的論調。於是，敏感的讀者難免要問：在這段帝國與黨國交橫的民國歷史時期，為什麼大量輸入柯倫泰的愛情論調？為什麼愛情被消失，卻留下一杯水理論的「黑鍋」套入柯倫泰思想的頭頂？

各國學者對「一杯水理論」的定義，其實來源應該是奠基於列

8 筆者目前蒐羅的《赤戀》版本有柯倫泰著、溫生民譯（上海：啟智書局，1929 年出版），以及哥倫泰著、過立先編譯（上海：開華書局，1934 年出版）。

9 這篇小說如何在蘇聯、日本和中國傳播與翻譯，可參考筆者的研究（陳相因，2019: 75-113），在 2019 年這篇論文裡，筆者將此小說翻譯為〈三代之愛〉。1920 年代末期，大多翻譯為〈三代的戀愛〉。

10 筆者目前蒐羅的《偉大的戀愛》版本有柯倫泰著、周起應譯（註：周起應即為後人所熟知的周揚）（上海：水沫書店，1930 年出版），以及俄國柯倫泰女士著、李蘭譯（上海：現代書局，1930 年出版）。

寧在蔡特金回憶錄中的批判，並非來自柯倫泰的生平著作或演講。例如，英國斯拉夫研究的學者馬許對這個專有名詞所下的定義是，一種「將更換性伴侶視為一件當口渴時喝一杯水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的觀點（Marsh, 2002: 201）。台灣學者楊爾琳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與軍隊色彩下對此術語的定義敘述，用語則如同上述《中國時報》的報導，夾帶較多負面評價的修辭色彩，部分所列術語的英語用法也不正確：

於是在俄國革命的初期，因性的關係的放縱，在列寧領導的革命黨內部，便出現了為世人所知曉的「一杯水主義」，把男女之間的性關係，視同喝「一杯水」（a cup of water）¹¹那麼普通，認為戀愛是唯心主義的玩意，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應該摒除。（楊爾琳，1981: 167）

上述指陳的「一杯水理論」發端，及其後續衍生義和生活例證，最啟人疑竇之處在於列寧在蔡特金回憶中的批判，但不管是在上述俄、英與中譯本的紀錄裡皆未曾指名道姓（除了一位年輕的維也納女同志和西蒙·佛洛伊德醫生之外），更不曾採取他過去慣有的手法，據此點名某個黨內重要人士而加以猛烈的政治鬥爭。同時，楊爾琳的論述再次驗證在黨國體制下不經證實卻廣為世人知曉的「傳說」，將一杯水主義指涉蘇聯初期的柯倫泰主義。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前述《中國時報》的報導在此體制下會將「一杯水主義」解釋為「權貴之門」（柯倫泰出身高貴，是俄羅斯帝國沙皇制度下的高階貴族）的產物，而這

11 應該是 a glass of water，中文為母語者習慣以茶杯（cup）喝熱水，但是歐美與俄國人慣用玻璃杯（glass）喝自來水。

群「太妹」、「太保」則無疑是柯倫泰主義的信奉者。誠然，如此強烈負面意義的批判用字自然映照出戒嚴時期反共抗俄的時代背景。

當我們追溯「一杯水理論」的源頭，前述徵引如陳碧蘭、陳喬年、葉華等例證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一杯水主義」時，不難發現這些「傳說」大多牽涉個人的口述回憶。除了葉華是當事人之外，其他兩例不僅有可能出現轉述的訛誤，而此三例還有三種語文以上（至少可以明顯看到德、俄、英與中文四種語言交錯）的翻譯。在這些語義轉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無法等價的文化問題？最後，倘若「一杯水理論」的提倡者如陳碧蘭所指是源自柯倫泰的〈三代之愛〉，那麼 1920 年秋天的列寧實在無從預知兩年後柯倫泰會有這部作品出現。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口述的「傳說」是否足以成為歷史？翻譯是否出現問題？

早在 1973 年，美國學者克萊門斯的專書即曾對「一杯水理論」提出疑點，指出在柯倫泰的著作裡「至今尚未讀到過這一特定的術語」（Clements, 1973: 323）。隨著蘇聯解體，越來越多柯倫泰的一手資料，例如私人日記被釋出，近幾年也有俄國學者提出相同質疑，並論證「一杯水」是柯倫泰不曾說過的「理論」（Говряков, 2017: 86-92）。克萊門斯指出，柯倫泰與此名詞定義最為接近的思想，是在“Тезисы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в области бра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論在婚姻關係領域中共產黨員道德的綱領〉）的「共產主義與婚姻性道德」當中第十八條（Clements, 1973: 336）。據此線索，筆者回溯 1921 年這篇刊登在 *Коммунистка*（《女共產黨員》）的〈綱領〉，並將之翻譯如下：

性行為不應被視為羞恥且罪惡的，而是自然並正當合法的，如同

其他所有的健康機能體現，如同滿足飢餓與口渴一樣，屬自然界現象者沒有道德與不道德之分。滿足一種健康而自然的本能，只有在它跨越衛生學建立的藩籬時才會變成不正常。這樣不僅為毫無節制的個人帶來健康的損害，也為亟需力量和精力工作的勞動集體成員，在保持自身的健康上帶來損失。（Коллонтай, 1921: 31）¹²

儘管克萊門斯提供了此線索，但她卻未分析柯倫泰發表此篇文章的來龍去脈與動機。柯氏之所以在《女共產黨員》發表上述這篇綱領，正是為了呼應前述列寧在 1920 年秋天與蔡特金會晤中，下達給蔡特金和在莫斯科全體婦女領導同志的指令，希望她們召開委員會，明確地規範共產黨員在性生活中應具備的道德，並將此綱領廣發給全世界的女共產黨黨員，林林總總共二十一條規範、三大重點和三項精神指示，用以嚴陣對抗「一杯水理論」（Коллонтай, 1921）。因此，此一〈綱領〉實非柯氏一人思想之結晶，而是集體開會討論的結果。然而，柯氏遵照列寧指示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開會總結所記錄寫下的〈綱領〉，最後卻被簡化且演變成為他人用以貼標籤和扣帽子的利器，成為最接近「一杯水主義」提倡者的證據。

筆者細閱目前世界上已出版柯倫泰的所有俄文著作與日記，證實了柯倫泰從未在著作中倡導，甚至從用字遣詞方面出發來看，在文本中從未出現過「一杯水理論」，更遑論進一步探索其思想與論述。本文欲舉證反駁的，正是一味將「一杯水主義」起源指向柯倫泰，千夫所指、眾口鑠金，卻無法提出任何證明加以驗證，並讓柯倫泰承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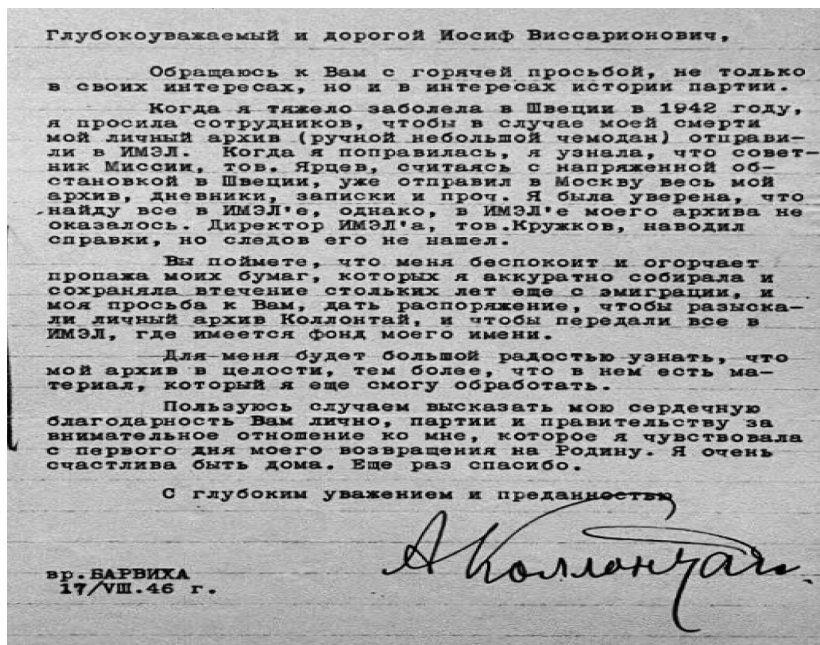
12 關於這一段落的第一句英文翻譯，可參閱 Barbara Evans Clements（1973: 336）。此為筆者根據俄文原版所翻譯。

列寧批判的代罪羔羊之責，蒙受了百年不白之冤。同時，也因為「一杯水主義」如此看似清晰、實則模糊的曖昧說詞，如前所述，容易成為政客或某種政治目的操弄的對象。因此不難使人聯想，特別是在列寧逝世後蘇共高層政治鬥爭日趨白熱化時，是否有人刻意「放話」，將列寧批判的「一杯水理論」和柯倫泰連結起來，讓後者成為眾矢之的，並藉機削弱她在黨內與共產國際的政治實力？

至於「一杯水主義」術語和概念的確立與傳播為何能眾口相傳，直到眾口如一地與柯倫泰相連結，卻乏人研究。筆者認為，倘若以托洛斯基的觀察來推論，從如何傳達一人代表一黨的中央黨意，並讓具備國際聲望的政治人物成為二手回憶的主要媒介或推手，並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列寧死後，托洛斯基垮台被流放到國外，而黨內高層同志接二連三被鬥爭、關押或被消失）出版這些回憶，再藉由黨內外口耳相傳，製造出捕風捉影、三人成虎的效果，原是史達林攀向權力巔峰的拿手絕活。¹³因此，讓柯倫泰創作與著作中最具力量的議題——「愛」——被消失，並凸顯一杯水的「性」，強化其女性身分和認同的議題，在革命後父權話語與文化結構並未改變的蘇聯，被抹黃與弱化的柯倫泰即使在中央委員會位居史達林之前，也不足為懼。

13 托洛斯基在研究與評價史達林一書中，曾經提到史達林相當注意黨內高層每一位同志的私生活。1917年春，當45歲的柯倫泰與28歲的戴本柯（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 1889-1938）的老少戀才剛萌芽，黨內無人知悉之際，史達林已察覺這段地下情，並利用耳語在黨內散播，使得這段顛覆傳統男女關係與地位的「不倫戀」，發生不久後即人盡皆知，震驚了大部分的布爾什維克黨黨員（Trotsky, 1941: 243-244）。史達林對柯倫泰的監控，從俄羅斯革命初期至其逝世從未間斷，舉例而言，1942年夏，當時任蘇聯駐瑞典大使的柯倫泰遭逢嚴重中風而住院時，她隨身攜帶密藏信件和日記的皮箱被史達林密探竊取並帶回莫斯科。直至復原後四年，柯倫泰寫信給史達林，懇求他把這些信件和日記歸還給她，此信件目前收藏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見圖四）。

圖四：柯倫泰懇求史達林歸還個人書信與文件的信



資料來源：同圖三。

此外，柯倫泰在列寧逝世與史達林崛起之後，從沙皇時代到列寧時期一身反骨又辯才無礙的她，卻從未針對套在她思想上的「一杯水主義」進行反駁，這就不由得使人起疑。最弔詭的是，柯倫泰在1928年後，未曾公開發表任何政治著作或政見，或者如她在1923年創作了一系列極為成功且流行的兩性關係和愛情小說，持續她的作家生涯。身為史達林時期唯一倖存的革命元老，加上敏感的政治動物，柯倫泰極有可能早就知道把「一杯水主義」扣在她頭上的元凶究竟是誰，但或許噤若寒蟬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如此想來，則「一杯水主

義」能和「柯倫泰主義」結合得如此緊密迅速又能廣在國際間流傳，除了柯倫泰自身保持緘默之外，背後有個「大他者」（Big Other）¹⁴或「老大哥」（Big Brother）的主動者（agent）在作用，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四、無法等價同值的「性」問題：俄、英、中三語翻譯

在俄文版的蔡特金回憶錄裡，將關於「一杯水理論」的談話標題美其名為「婦女、婚姻與性的問題」，但當中絕大部分的強烈批判就是所謂的「新的性生活」（новая половая жизнь）。然而，如果將俄語 половая 翻譯為英文 sexual，或中文的「性」，就引發了語義和文化是否等價同值的爭議。

然而，在列寧的談話中，主要的俄文關鍵字 пол 是否能完全對應中英文裡的「性」與 sex，則值得深入探索。按照普爾斯（Charles S. Peirce）（Hartshorne, Weiss and Burks, 1931-1958; Bassnett, 2003: 34）在符號學裡所提出的語義與句義層面的概念而言，筆者建議，俄文與英文兩字的等價意義相較於中文翻譯更能相互貼近對方。根據烏夏可夫（Д.Н. Ушаков）、庫茲聶措夫（С.А. Кузнецов）分別編輯的兩套俄語大字典（Ушаков, 1996; Кузнецов, 1998），пол 一詞在語義階層

14 楊小濱曾在研究中引用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1901-1981）的「小他物」（*objet petit a*），以為符號化現實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乃是因為按照「大他者」的意志建構起來的秩序，進而將當代中國裡無所不在的毛澤東形象比喻為「大他者」。同時，「大他者」亦可呼應喬治·歐威爾筆下父權與極權結構代表人物「老大哥」（Big [Br] Other）的意義。在此，筆者挪借此一術語來說明史達林主義崛起後的蘇聯社會，也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現象和問題。見楊小濱（2007: 150-153）。

最初第一個意義指的是地板，第二個才是性和性別。然而，當此俄文字指涉性與性別這一層意義時，此單字加入特定形容詞構成性別的詞語後，在歷史發展中卻早已和法語的 *sexe* 產生緊密的對應與連結。例如，俄文詞語 *прекрасный пол* 翻譯自法文詞語 *le beau sexe*，表面意義是美好的性別，實指女性。詞語 *сильный пол* 是來自法文 *le sexe fort* 的俄文翻譯，表面詞義是強力的性別，但實際上意指男性（Ушаков, 1996; Кузнецов, 1998）。從十八世紀後半葉開始，俄語和英、法兩文共享不少相同字根或字源的單字，而英語 *sex* 與法文 *sexe* 兩字正屬此類、同根同源。根據牛津大字典，這個字在兩語之間的交換互通，早已行之有年。但須注意的是，這個字在英、法兩語中分屬意義階層之第一原意，在俄文內卻是次要的意義。

中文裡「性」字的意義階層與文本脈絡，隨著千年歷史發展，較之俄、英、法文恐怕更廣、更多。《古文字詁林》（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1999: 945-946）一書詳列許慎、馬敘倫與沈濤曰對「性」字解，前者將之定義為「人之陽氣善者也」，後兩者更增加兩個意義，一為性情，二為生命。據《康熙字典》（張玉書，1968: 416），「性」的字義有下列四種解釋：一謂「天命」，乃「賦命自然」，通論則指「生也」，三解為「無為而安行」，最後一種乃等同於「姓」字而解。但是當代出版的大字典，舉《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高樹藩，1974: 489）為例，詳述「性」的意義則多達八種，而且詞性除了原作名詞解外，更添變化為形容詞後的解釋。這八種意義除了古來常用的稟性、生命、生活的三種可能外，也可意指「無生之物，其特具之質味體態、效用，例如物性、鳥性、獸性等義」，亦可解成「心意」、「五行」或「唯一不變的真理」。與本文相關且最重要的，就是將「性」解釋成「生物之生理差別」，其形容詞則指「於男女肉慾有

關的」。由此推論，用「性」一字區隔男女，應該是在清代中末期後，在此之前，「性」與前述的英、法、俄單字並不等義。

參閱索緒爾研究語言的方法，詳論「性」在四國語言意義的歷時（diachronic）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同時意在論證「性」在法、英、俄與中文等翻譯文本脈絡裡，符號之間的橫向句段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有親疏之分。儘管這樣的遠近親疏關係極可能與地理環境遠近、文化交流先後和頻繁程度相關，但重要的是，這樣的分別影響了翻譯文本字裡行間的縱向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也就是說，四國語言裡 *sexe* 和 *sex* 可以歸類於同義，*пол* 和性需視字句的其他部分組合來斷定意義。由此可論，*sexe*、*sex*、*пол* 和「性」嚴格說起來並不能稱為「同義」字，俄語翻譯 *пол* 只有第二個意義符合英、法字義，筆者將之稱為「半部分類義」（另一意義為「地板」，則全然無涉此意指）。

隨著蘇聯改革開放後解體至今，「性」的文化，不論是議題或商品，在公眾場合裡已經逐漸地被俄國大眾接受討論。或許有感於自身文化對「性」所意涵的概念與英美十分不同，許多俄國翻譯者採用直接音譯方式將 *sex* 轉為俄文 *секс*，並衍生出許多以此為字根的新字，如 *сексуальность*（來自英文字 *sexuality*）等等，試圖創造出不同於蘇聯時期「無性文化」的「新性文化」。然而，對於象形字的中文系統而言，對於歐美傳入的字、字義、語義及文化卻無法等價化。

不同於歐美和俄羅斯在文字與語義發展上有較久遠相互滲透的歷史，以「性」確切指涉「性事」與「性別」，在中文發展上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在 1918 年五四重要刊物《新青年》掀起女子是否應該守貞操的議題，一時文人名士如周作人、胡適等紛紛加入論戰，1920 年代過後，騷人作家如郁達夫、張資平、劉呐鷗等也群起描寫與此議

題相關的作品。以「性」字區別男女的用法，則是 1925 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競生（1926, 1927）接連發表《美的社會組織法》、《美的人生觀》後，如此新義才日漸普及（彭小妍，2001: 77）。張競生在書中倡導「新女性中心論」，主張性美學烏托邦，認為女子無論從性事到國事都應該爭取主導權的這一學說，在當時廣受青年男女喜愛，其書版暢銷，市場反應十分熱烈，1926 年上海更出現以女性為名的《新女性》。關於張競生或《新女性》，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不再贅述。

由此可知，中文翻譯的「性」字指涉英文 sex 或俄文 пол，僅有相對小的部分意義相符，且此語義脈絡的「部分共義」幾乎無法與文化上的意義等價。從以上最細微的語義差異探究入手，牽引出的中、俄之間在「性」與「戀愛」文化上其實存在著相當巨大的差異：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已有不少作品探討性、愛情與婚姻的婚外情作品，信手舉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Н.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的 *Что делать?*（《怎麼辦？》，1867 年出版）、托爾斯泰（Л.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的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安娜卡列尼娜》，1878 年出版），到契訶夫（А.П. Чехов, 1860-1904）的“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帶小狗的女士》，1899 年出版），都是影響柯倫泰甚鉅的作家和作品（陳相因，2019: 89）。然而，這些文題在十九世紀以降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名著中則較為罕見。公開談戀愛、討論性，相較於中國文人，對於俄國文人而言更顯稀鬆平常。

上述這些文化差異帶來的許多問題，也反映在駱劍冰的〈柯倫泰主義與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一文內：

明顯地，柯倫泰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中國封建勢

力，日趨崩潰，民族資產階級抬頭，新的革命勢力震撼中國的窮鄉僻處，覺悟的青年男女們，從舊的包衣裡脫出來，到新的世界裡，追求著新的生活，提倡著新的學術，奉行著新的主義，同時在驚濤駭浪的生活中，熱烈地追逐著戀愛，盲目地採用著柯倫泰對布爾喬亞道德攻擊的理論，做自己放縱荒淫的口實，實行他無政府狀態的性底行為，不受任何制度的限制，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道德的；雙方都不願負家庭的負擔，養育的責任，不去顧慮到身體的健康。（駱劍冰，1933: 86）

駱劍冰為讀者展示了 1930 年代左傾與左翼的中國青年男女的心態，在上段敘述裡凸顯了幾個她所見到的中、蘇之間的重要差異。首先，中國是舊的、封建的、民族資產的窮鄉僻處，而蘇聯是新的革命勢力、新生活、新世界、新學術、新主義，柯倫泰作品為其中一個代表。其次，青年男女因為讀了柯倫泰的作品，所以「覺悟」如何在「驚濤駭浪的生活中，熱烈地追逐著戀愛」。然而，正是這種「追求」與「追逐」新的一切而「盲目」，所以將「一杯水主義」誤以為是柯倫泰主義，但駱劍冰以為，這其實是「柯倫泰對布爾喬亞道德攻擊的理論」。至於何謂布爾喬亞道德與一杯水主義？即是「放縱荒淫」、「無政府狀態的性行為」、「不受限制」、「不負責任」和「不顧健康」。那麼，何謂真正的柯倫泰主義者與無產階級道德呢？

駱劍冰舉茅盾小說《動搖》的孫舞揚為例，認為「她的意念中只有共黨，只有集團，忘卻了自我，信仰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戀愛和穿衣吃飯一樣，只問需要，有戀愛，不感到喜悅，沒有戀愛，也無悲哀，她為某種環境需要，可以犧牲自己的個性，不愛而勉強地去愛，她的意識形態，生活形態，徹底地集團化了，這才是柯倫泰主義的忠

實的奉行者」(頁 87)。在這篇文章中，駱劍冰下了一個「無產階級道德」為何的結論，她認為是「一夫一婦」、「純潔靈智的感情」、「人類共同的享樂」，以及要忍受一切的苦難直到偉大的理想世界實現為止(頁 89)。

儘管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駱劍冰的論點令人啼笑皆非，但卻並不令人詫異。儘管她口口聲聲的柯倫泰主義，與柯倫泰著作中提倡兩性在戀愛、性關係與「新性道德」，對照後呈現出恰恰相反，甚至完全背道而馳的論述。其實駱氏所言的「一夫一婦」、「純潔靈智」、「共同享樂」和「忍受苦難」等用字遣詞與論調，反而更接近史達林主義者所心心念念的，一種清教徒式的道德觀。換言之，由英文、法文和俄語互滲共生所創造出來多姿多彩的「性」文化，正如何倫泰在“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Письмо к трудящейся молодежи”(〈給展翅的愛神一條路吧！——給勞動青年的一封信〉，1923 年出版)當中提到「多面性」與「多弦性」的「同志情感」(陳相因，2019: 87)，在翻譯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後逐漸被強力的政治壓縮，「性」這一字所代表的含意和創造出來的文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毛澤東主義的照耀下，最終找到了它與蘇聯史達林主義等價的大一統歸屬：單一化、集團化、黨國化，可以犧牲自己，永遠忍受苦難，因為「偉大的理想世界」永遠不會實現。

五、消失的愛與「新婦女」：柯倫泰的新性道德與母系社會理論

柯倫泰在小說創作與政治理論寫作兩方面，分別深受十九世紀俄羅斯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與馬克思理論家恩格斯的影響。恩格斯根

據並大量地援引美國人類學與社會學理論家摩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的研究，在《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探討古代社會裡家庭的發展歷史，試圖論證母系社會與母權制曾經存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創作的小說《怎麼辦？》則是以女人為主體，敘述女主角如何在男主角的幫助下掙脫傳統婚姻的束縛，脫離家庭，創辦一所實行社會主義原則的縫紉工廠，又因為愛上男主角的好友，感到左右為難時，男主角為了成全她的幸福假裝自殺，飄然遠去，投身革命。全書的宗旨鼓吹女人，甚至是個人的命運需要自己掌握，致使年輕的柯倫泰與同時代女人心神嚮往，甚至相信女人當家、母系社會和母權制，在革命過後的蘇維埃社會是可能實現的。

柯氏因此為未來母系社會與母權制的可能性洋洋灑灑寫下“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新婦女〉，1913 年出版），同時也將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命名為 *Любовь пчел трудовых*（《勞動蜜蜂之愛》，1923 年出版）。眾所周知，蜜蜂的社會體系是雌多於雄（從蘇聯到今日俄羅斯，男女比例一直處於懸殊狀態，女性多於男性將近一倍），並且是以女王蜂為主；柯倫泰的政治野心細藏於著作中，同為競逐大位的史達林向來密切注意所有政治對手的言論與著作，不可能沒有察覺。因此，當 1930 年史達林宣稱蘇聯境內再無性別與婦女問題，並關閉曾經由柯倫泰所領導的「婦女部」（Женотдел）時（Stites, 1978; Porter, 1987; Goldman 1993, 2001），形同斬斷了柯倫泰對於蘇維埃成為母系體制的政治夢想。各種來自蘇聯的主義，例如托洛斯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甚至是柯倫泰主義，進入中國後在 1930 年代後期逐漸化整為一元的史達林主義，而當中柯倫泰的「新婦女」概念也因此逐漸被歸化成如駱劍冰的文章所呈現的——史達林主義下的柯倫泰主義的新婦女，而原本的論述主體已經消聲匿跡。

綜觀柯倫泰的著作與創作，「一杯水主義」從來不是柯倫泰的主張，性別（特別是女性）與階級（尤其是工人）間的「自由」、「平等」、「博愛」與「獨立」，才是她始終如一關注的議題。在創作方面，柯倫泰的小說不論在蘇聯、日本或中國皆獲得相當大的迴響，也進一步刺激並影響東亞女性作家寫作的生涯發展（陳相因，2019）。這些小說中除了〈三代之愛〉的瑞娘之外，幾乎所有女主角的性關係皆源自愛情。柯倫泰筆下的這些女主角也正因為心中充滿愛，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不論是在對待兩性關係上，甚至延伸到革命事業，都是十分認真。然而，弔詭的是，這些「談情說愛」的柯氏小說被翻譯傳入革命的中國後，引發了一系列「戀愛與革命」的小說創作，卻又因為中國的革命日漸步入史達林主義的後塵，使得情與愛必須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鋼鐵是如何煉成」的意志，於是女性「自我」的「一杯水」反而變成黨國男性集體煉鋼的性工具，這或許是革命前的柯倫泰始料未及的發展和結局。

六、結論

綜上所述，性議題與「一杯水理論／主義」不僅是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甚至是中國國民黨黨國機制下的產物，也是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美蘇兩大帝國對峙，在父權話語結構的媒體操作下的產品。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哪一時期的帝國、何地的民國、什麼黨的黨國，抑或在地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儘管這些都有層次或程度上的區別，卻皆無法否認在這些制度下或過程中父權結構與話語權的頑固存在。首先，正是這樣的結構，在不同時代以各種傳播形式羅織了柯倫泰的「罪名」，使之成為千夫所指的列寧的「代罪羔羊」。其次，因為這樣牢固的結

構，使得不論是在「帝國」、「民國」與「黨國」的政權下，皆可使「一杯水主義」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過程內，可以快速地結合「柯倫泰主義」或思想，而產生了誤讀、誤解與誤用長期發展，且使人深信不疑的現象。

再者，正是威權與父權同謀的話語，刻意抹滅了柯倫泰以自由戀愛為基底的兩性關係主張，導致原本應該是相當嚴肅的性關係公共領域討論，演變成被扣上一頂探人隱私並指責或嘲笑他人性濫交的「一杯水主義」大帽子。以如此嘲笑奚落或者是抹黃作為一種手段，犧牲伊凡諾娃和柯倫泰的女性個人聲名，讓她們分別背負去史達林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黑鍋，以達到男性領導的政治意圖，不論是政治上的「重建」，還是個人權力的「登峰」「造極」。

從本文也清楚得見，「一杯水理論／主義」的提倡者絕非柯倫泰，經筆者十年考證，這一專有名詞從未出現在柯倫泰的著作或創作中。儘管是柯倫泰集結眾人開會論點所撰寫的〈綱領〉中最接近的字句，亦屬於列寧指示下集體會議的開會決議。此外，不管是列寧強力批判的「性」，或者是柯倫泰大力提倡的「愛」與「新婦女」，一旦進入帝國瓜分、黨國不分的民國時期，都面臨了翻譯與傳播過程中失去原義和原意的問題，最終淪為吸引青年男女投身共產革命並傳播史達林主義的政治工具。時至今日，不少知識分子或學者依舊認為「一杯水主義」源於柯倫泰的思想，如此誤讀、誤解與誤用，在經過將近一世紀仍得不到學術的考證與平反。因此，釐清「一杯水主義」的來龍去脈，並將之與柯倫泰思想脫鉤，這才是本文論述最重要的目的。

在「一杯水主義」的翻譯與傳播過程中，1920、30年代的左翼小說與共產黨文藝評論，刻意抹殺「愛」的情感成分並凸顯性的需求。由此可見，在男性主宰話語權與領導權的帝國、黨國和民國世界

裡，「性」不僅是建／解構意識形態的政治議題，更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在不同時空下，伊凡諾娃的「在蘇聯沒有性（只有愛）」再次掀起性的話題與意識形態問題，令人不由得懷疑：經翻譯與傳播中刻意抹殺愛情的，不論是「一杯水主義」純粹性享樂的標籤，抑或史達林主義下無性文化的笑話，是否皆容易致使女性淪為為集團而犧牲個體自我的工具，又或者是被隱含政治動機的男性推向前線成為先鋒，成為打擊對手的一種手段？

參考文獻

- 中國時報（1956年8月17日），〈「一杯水主義」的必然結果：大鼻子淫邪不正，小鬼們男盜女娼——蘇聯太保太妹盡出權貴門第〉，4版。
-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1999），《古文字詁林》第八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列裴耐夫、沈端先（1930），〈論文：伊里幾的藝術觀〉，《拓荒者》，1(2): 249-260。
- 吳佩珍（2020），〈女性解放與戀愛至上主義之間：柯倫泰與日本大正、昭和期思潮〉，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103-13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沈端先（1930a），〈《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文藝講座》第1期。
- 沈端先（1930b），〈文藝大眾化問題：所謂「大眾化」的問題〉，《大眾文藝》，2(3): 275-276。
- 沈端先（1930c），〈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三・一五」〉，《拓荒者》，1(2): 763-770。
- 易嘉（1932），〈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2(2): 55-61。
- 茂森唯士、沈端先（1930），〈俄國：革命十二年間的蘇俄文學〉，《大眾文藝》，2(3): 171-188。
- 夏衍（2005），《夏衍全集·卷八·文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 高樹藩編纂（1974），《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
- 張玉書編纂（1968），《康熙字典》第四冊。台北：台灣商務。
- 張競生（1926），《美的社會組織法》。上海：北新書局。
- 張競生（1927），《美的人生觀》。上海：北新書局。
- 陳相因（2007），〈陰陽顛倒、陰盛陽衰到「陰錯陽差」？——論托卡列娃作

品裡俄國兩性特質與性格的變化》，宋雲森編《俄羅斯文學的傳統與創新》，205-226。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陳相因（2008），〈「一杯水主義」的誤讀、誤解與誤用：柯倫泰在蘇聯與中國〉，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主辦「第一屆斯拉夫語言、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5月29-30日。

陳相因（2011），〈論《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翻譯與傳播——1924年以前柯倫泰在新俄羅斯、蘇聯與中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 1-31。

陳相因（2019），〈嫵媚、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4: 75-113。

陳相因主編（2020），《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碧蘭（2010），《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

彭小妍（2001），《海上說情慾：從張資平到劉呐鷗》。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楊小濱（2007），〈中國前衛藝術中的紅色記憶幽靈〉，《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1: 149-183。

楊爾琳（1981），〈從「一杯水主義」到新封建兩性關係——中共黨員行為模式綜合研究之一〉，《復興崗學報》，27: 167-208。

葉華（耶娃·蕭）（1999），《世紀之戀——我與蕭三》。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駱劍冰（1933），〈柯倫泰主義與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生存月刊》，4(4): 86-89。

杉山秀子（2001），《コロンタイと日本》。東京：新樹社。

秋山洋子（2010），〈コロンタイの戀愛論の中國への紹介をめぐって〉，《駿

河台大學論叢》，40: 71-90。

- Bassnett, Susan (2003).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BBC (2005/10/11). Советский язык. Retrieved from http://news.bbc.co.uk/hi/russian/talking_point/newsid_4291000/4291692.stm
- Chen, Hsiang-Yin Sasha (2006). *Conflicts between patriarchal morality and female sexuality in the prose of Viktoriia Tokareva and Tie N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lements, Barbara Evans (1973). Emancipation through communism: The ideology of A. M. Kollontai. *Slavic Review*, 32(2): 323-338. doi: 10.2307/2495966
- Coeuré, Sophie (2021). Two women gaining power through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leksandra Kollontai and Suzanne Girault. In Korine Amacher, Frithjof Benjamin Schenk, Anthony J. Heywood, and Adele Lindenmeyr (Eds.), *Personal trajectories in Russia's Great War and Revolution, 1914-22: Biographical itinerarie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pp. 145-166). Bloomington: Slavica Publishers.
- Engels, Friedrich (190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Trans. Ernest Unterma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Goldman, Wendy (1993). *Wome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Wendy (2001). *Women at the gates: Gender and industry in Stalin's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tshorne, Charles, Paul Weiss, and Arthur Burks (Eds.) (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ldt, Barbara (1987).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Stanley (1956/8/16). Russ youth orgies fret newspaper. *Santa Cruz Sentinel*, vol. 100, No.194.
- Kelly, Catriona (1994). *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on, Igor' Semyonovich (1995).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Russia: From the age of the Czars to today*. Trans. James Riord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arsh, Rosalind (2002). Realist prose writers, 1881-1929. In Adele Marie Barker and Jehanne M. Gneith (Eds.), *A history of women's writing in Russia* (pp. 175-2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 Rosalind (Ed.) (1996).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Cathy (1987). *Women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ites, Richard (1987).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otsky, Leo (1941).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Trans. Charles Malamuth.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 Говьяков, И. Ю. (2017). Теория, который не было: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 и «стакан воды»,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СМИ*.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2(4): 86-92.
- Горелик, А. 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а (2004/10/01). В СССР секса нет?.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104041945/http://spb.kp.ru/2004/10/01/doc36553/>
- Душен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2019). *Цитата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ультуры*:

из истории цитат и крылатых слов.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РАН.

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912). Любовь и новая мораль. 沈端先、汪馥泉譯 (1929), 《戀愛與新道德》。上海: 北新書局。

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921). Тезисы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в области бра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ка*, 12-13: 31.

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923). Любовь трех поколений. Большая любовь (СПБ.: Азбука-классика, 2008 年復刻版), С. 317-351。柯倫泰、芝蕙 (1928) 譯, 〈三代的戀愛〉, 《新女性》, 3(9): 8-46。

Кузнецов, С.А. (1998). *Большо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б: Норинт.

Ньюман, Дина (2017/6/28). “В СССР секса нет”: что был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BB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russian/features-40281053>

Ушаков, Д.Н. (1996).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3. М.: Терра.

Цеткин, Клара (1924).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Москва: ИМЭЛ при ЦК ВКП(б). Trans. Sally Ryan (1934). *Reminiscences of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馬清槐譯 (1954), 《列寧印象記》。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簡介

陳相因，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語言所俄國文學史系碩士，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斯拉夫研究系與東方研究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文明系與斯拉夫研究系三系聯合訪問學者，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訪問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俄羅斯暨蘇聯文學、比較文學和電影研究。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戰爭、傳統與

現代性：跨文化流派爭鳴》（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0 年）與《聶隱娘的前世今生》（時報，2016 年）等書。

〈聯絡方式〉

Email: hyschen@gate.sinica.edu.tw

Love Doesn't Need Translati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Treating Sex Like Drinking a Glass of Water” in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Hsiang-Yin Sasha C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phrase “treating sex like drinking a glass of water” and argues that Alexandra Kollontai had never advocated it in her oeuvre. This term, however, originates from Clara Zetkin’s memoirs of her meeting with Vladimir Lenin in the autumn of 1920, when he condemned young comrade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their view that satisfying sexual desires should be as simple as drinking a glass of water. This article articulates the socia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ntext of transmitting or translating this ter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ttempting to show that it was used as a product of patriarchal hegemony to oppress not only Kollontai herself, but also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matriarchal power under the Communist system. The term is furthermore the result of misinterpretation,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Kollontai’s writing.

Keywords: Kollontai, Lenin, sex as a glass of water, matriarchy, Stalinism